

论同光体诗人袁昶

贺国强

(华南农业大学人文学院, 广东广州, 510640)

摘要:近代诗人袁昶在同光体浙派中有着重要的地位。过去学界一直认为他是洋务派作家,通过对其政治活动与主张的具体考辨后指出,他应该属于维新派作家。在晚清特定政治背景下,袁昶既不能济世救国,又不能隐逸闲居,只能以一种痛苦的“朝隐”心态来消磨时日,这使得他大量的山水诗具有独特的意味。由此两方面入手,我们能够较全面地重新认识这位过去被视为保守派的诗人,同时,也能够对其诗歌创作中丰厚的内蕴、磅礴的情感与风格的博综做新的评价与体认。

关键词:袁昶;同光体诗人;沈曾植

中图分类号: I206.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2-3104(2008)02-0286-04

晚清同光体浙派诗人中,袁昶光绪六年(1880)在北京和沈曾植相交,讲学论诗。沈曾植年龄稍少于袁昶,其诗文与袁昶渊源极深,这从沈作《题浙西村人初集》一诗就可窥见。袁昶对沈曾植的影响显示出他在浙派中的重要地位,汪国垣因即比譬为近代诗坛上的“天勇星大刀关胜”。

袁昶思想上深受道、释思想的熏习,据说在任吏部主事、光禄寺卿后曾两度因时事日非而有退隐之志。事实上,袁昶虽然没有真正遁迹山野,但他的内心有着深厚的朝隐情结。他性情中闲散冷傲和耿直忠介兼具,袁昶的诗歌在同光体浙派诗人中较多地承续了秀水诗人好描摹清佳山水的特点,较沈、金多了些萧远清秀之韵,远绍厉鹗,也算得是清代浙派山水诗的后劲。他有关山水诗的诗学理念,也可能影响了沈曾植的“三关说”。这是袁昶在同光体浙派诗人中的特异之处。

一、袁昶所属之政治派别考辨

袁昶(1846~1900),字重黎,号爽秋,一号浙西村人,浙江桐庐人。光绪二年(1876)进士,授户部主事,后任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章京。历任安徽宁池太广道、江宁布政使、光禄寺卿、太常寺卿等职。庚子事变中因上疏力谏被杀,后被誉为“三忠”。有《浙西村人初集》《安般簪诗续钞》《于湖小集》《水明楼集》等著撰。

从文化角度探究近代诗人,是理所当然的事情。同光体诗人的政治态度最为后人诟病,厘析错综纷乱的社会环境中诗人应对的文化立场、政治主张是很有必要的。袁昶与樊增祥、易顺鼎同为张之洞门下高第,过去误以为其与张之洞同属洋务派,其实不然。^[1]袁昶作于光绪九年(1883)的《送张副都叙》,是袁昶初涉政坛时写给“清流党”张佩纶的赠序,文中征引了庄子的观点说:“巧有余而朴不足,则民相率背义而向利,背义尚利则人心之防溃肆衡决,事变将穷无复之”,“欧洲诸岛皆是也”。他认为张佩纶“效其所为”,购船造舰,不知修明内政,“犹之弥甚”^[2]。他自己为政的方法不过是分清官员职权、实行实物税等主张。张氏是清流派的代表之一,提倡洋务,由此可见袁昶早期并没有接受洋务派思想。

光绪15年(1889),袁昶任译署总章京,在此间,采摭当时人推行西法的上书,编为《筹洋丛牒》,他可能因此而接受西方科技知识和思想学说。清政府出使大臣的公牒,按惯例由总章京代陈,袁昶由此和薛福成、黎庶昌、黄公度、徐建寅相交深契,他还曾暗中推荐黄公度为驻英参赞,薛、黄等人的维新派思想对袁昶势必影响很大。戊戌年间,袁昶在安徽任上,向光绪帝条陈政要一万八千余言,得光绪帝赞赏,并迅速提拔为江宁布政使,八月到京城,调任直隶布政使,赏三品京堂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行走。戊戌政变期间,他多方谋划,参拜各国使节,对维新事业有所贡献。

收稿日期:2007-10-11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规划项目(06JA75011-44042)

作者简介:贺国强(1975-),男,湖南双峰人,华南农业大学讲师,博士,主要研究方向:清代、近代文学。

政变失败后，黄遵宪被关押在上海，袁昶极力为他辩解，得以免祸^[3]。袁昶的政治主张在《袁太常戊戌条陈》中可以窥见。条陈认为晚清时局百孔千疮，外侮交乘，内忧交迫，维持国计必须以“内治外交”为纲领。他分析列强觊觎神州的态势时，以为“俄日之祸纾而大”，德英诸国之祸“急而小”；“以目前物力兵力不能议战，要不可不议守”。所以在外交策略上要选聘精通洋务的外交人才，尽力和西方列强修好以纾祸，对内则要整顿边防。内政方面，袁昶说：“由宋、金、元、明以迄我朝，革命不革政，率以用文法太密而弱，误国毁名。欧墨俄倭因利乘梗，皆以用文法疏阔而强……中国非亡于外夷而亡于名法耳！”^[4]“名法”使天下英豪之精神、才力消磨殆尽，他还举例批评洋务派沈葆楨虽然忠诚报国，但拘泥文法。他并且提出了改制、人事、理财、练兵、交邻等一系列变革主张，荐举了郑孝胥、陈三立、曾纪泽、薛福成等人。

维新派对帝国主义存有幻想，主张联合英德美限制俄日，以夷制夷，还想靠其支持完成改革自强事业，而顽固派是亲俄的，袁昶对外交的分析站在维新派立场上。他激烈批评封建“名法”的繁密，这已经触及统治制度本身，不再是“中体西用”。不过袁昶也只不过可以被看做维新人物中比较保守的派系，他提出的改革措施如中央分权给地方官员、绅士，停止纳捐，主动开放通商等等，远不如康有为、梁启超激烈。由于文献的缺失，袁氏戊戌后日记被毁，诗也仅编年至1897年，很难进一步考知袁昶的政治观念。

在袁昶的诗集中，有不少诗表明他不但推崇西方科学技术，如《火轮船行》《颂千里镜》等，而且还赞赏西方资本主义政治制度，这由他和维新派人士张荫桓、张謇、黄遵宪、文廷式、翁同和等人的众多交游酬唱之作可明。如作于光绪二十一年(1895)的《简黄公度》一诗推扬《日本国志》：“于今龛拯资方略，不独骚材赋涉江。”^[5]黄遵宪自作诗也记袁昶说此书早成，可省岁币千万。概言之，袁昶在中法战争后逐步接受了维新自强思想，成为维新派中一员应属无疑。

二、依违两端的“朝隐”心态与袁昶诗歌的主题

面临社会的动荡不安、国家的积贫积弱，以及各种文化技术、伦理道德、价值理念如潮涌动，生息于其间的众生难免产生忧虑、苦痛、愤慨、惶惑、无奈诸般情绪。袁昶年轻时读书博涉四部，而不囿于汉宋师承，还接触过西方思想学说，对秋声四起的社会氛

围自然比常人有更深的感知。这位10岁便通五经的神童，14岁时陷于太平天国起义军中，社会动荡留给他的肯定是悲苦的回忆。袁昶毕竟是一个封建文人，并不能冲决儒家正统思想的罗网。他虽自称“男儿当以马革裹尸，我死会在戎马间”；可是他坚持拯治国家必先审于内政，要用勾践卧薪尝胆的精神来增修政治，汲纳贤才；不能如清流党派甲午前那样与外人“好勇斗狠”，变法要务实而不能空言。尽管他骨鲠格高，在任地方官时也恪尽职能，办理了整顿关税、兴修水利等实事，但以这来拯治摇摇欲坠的清王朝只属图劳。

生活于封建末世的士人，较之前代其心灵要饱尝更多痛楚，尤其是那些传统思想观念已经融入其肌体骨髓的封建官吏，外来文明的力量使其原有的理想信念受到前所未有的挑战，而对此用传统的思路来应对是毫无补救的。时人笔记中记袁昶“甲午诸诗，愤欲死国，后有心疾，喜怒不恒，常呼侍婢，予以一剑，取太太首级来。当时谓爽秋得狂疾，张文襄以电报询状，实有此事”。^[6]又记“袁氏颇耽女色，戊戌过海上，与诸词人排日为欢”。^[7]在国势日蹙，己才难伸的境况下，一方面传统士人经世济时的理性使他依然出仕为官，尽心朝政；另一方面日益危险的社会态势又使得他怀疑自己的理性追求，私下尽情放纵情欲，来平衡补偿内心深处的空虚，甚至佯狂假痴。袁昶虽汲取过一些变革思想，但他和沈曾植一样，其理性意识中旧学还是占了主导地位。社会现实中的矛盾渗透到他的心灵深处，使他备受压抑，他只能在自谓的“朝隐”状态中度日。

要把握袁昶的心态，袁昶的诗作中最有份量的纪时叙事之作与山水写景诗就很自然地进入了我们的视野。袁昶少年时崎岖兵间，壮岁又担任地方官，这使得他对民瘼民艰有着较近距离的观察。袁昶反映民生疾苦的诗歌主要披露天灾人祸给人民带来的艰辛，比较有特色的如《读袁康沙船叹歌以赠之》，生动地描叙了海禁开放后，西方各国对中国进行经济掠夺，使得本国商船破产，“从此沙船生事微，篙工零落各东西。”清廷又兴办洋务工业，想要与外国列强竞争，而“静县饥民面如鹄，春种家家卖牛犊”^{[8]（卷二）}的现实却无人理会。不过，袁集中表现民生忧患的诗歌不多，较多的是反帝侵略主题的爱国诗。鸦片战争以后，抵御外侮、保卫中华民族已经成为时代的首要问题和任务，在此形势下形成了一股不断递进的爱国诗潮。袁昶亲身经历中法战争和中日战争，蒿目时艰，俯仰啸歌，其诗作传达着自己的孤忠忧愤，具有强烈的历史感。如《马关四首》直斥李鸿章投降派之流的庸腐误国，

在历史与现实的对比中抒发着其极度的愤慨。

袁昶所面对的是一个灾难深重的时代,他因甲午战败,几欲死国。而因历史的局限性,袁昶找不到自我的出路。他性喜老庄,在心灵窒缩时避世隐居自然成为其向往。由云龙《定庵诗话》记袁昶有诗云“猿公剑术本粗粗,那得仙姝一起予。会使林深不可见,烟餐雾隐且胥疏”^[9],指出他有归隐之意趣。“人生思少日,乐事道咸前”^{[8](卷十一)}(《忆旧二首》其一),人生道路的崎岖坎坷,社会世情的危亡四处,使得袁昶由“初志不在小,劲气揽八荒。金石镌不已,辄火而摧刚”转变为“多困乃思返”^{[8](卷十一)}(《幽居四首》其三)。袁昶自叙其心迹说:“世途剧险巇,使我心魂惊。善哉庄生语,貌厚而深情。风波起方寸,弹指变枯荣。我欲逃世去,何方养残生?”^{[8](卷十一)}(《幽居四首》)其一诗作于壬午(1882)年,袁昶方入仕途,已感前路茫茫,但他毕竟不曾做隐士。他后期的诗作吐露了其欲隐未隐的原因。作于甲午(1894)年的《自题披僧伽梨小野》,其一写道:“中有伤心画不成,先公儒释界分明。若为畔去过庭录,休认昆山顾阿瑛。”^{[10](卷三)}可以说,不肯脱逸家族传承儒学的拘室,是其不能逃禅隐退的动因。成玄英疏《庄子·缮性》说“圣人降迹尘俗,混同群生,虽居朝市,何异山林矣。”这种朝隐宗旨成了袁昶“养生”的途径。袁昶对其朝隐心态有过反思与悔忤,但更多留下的是叹息、无奈。他有一首《自讼》诗说:“已入孔融过二年,道根器业丙茫然。敬忠尺捶用不尽,利欲漆盆犹未捐。既障微云点净月,未除浊水搅清渊。代农一味充朝隐,只第三流名字传。”^{[10](卷六)}全诗以自讽的口吻诉写了依违于仕隐之间的尴尬。与道释思想有着密切联系的隐逸文化,其精神主旨是回归自然,与自然山水冥合同一,在对自然山水的冥观默照中体悟道体,以期超脱浮世沉滓而潇然尘外。袁昶自言“仆曲木散材,局迹代农,廻旋依隐,耽陆沉而无远志。触物寓兴,偶拈韵语,率逞胸臆,不求工律,但取剽剥儒墨,揣度情伪,写萧寥独往之趣,寄虚己游世之指而已。”^{[10](卷首)}(《于湖小集》题词)就这样,山水风景诗成为他抒写潇洒出尘意旨的媒介。

袁昶的山水景致纪游诗历来评价颇高,袁昶的山水诗不似厉鹗那样偏重于营造萧寥冷峭的意境,以此来安慰平抚自己的坎坷蹇淹。袁昶山水诗的面目大多是在对自然景物体察中思考世事天道,于萧逋清峭的笔致中暗蓄一股郁抑不平之气。如《夜起》云:“竹闲残雨犹滴沥,竹下湿萤枯一点。萧然夜起无一事,河汉欹斜波潋潋。槐中万蚁战方酣,井底四蛇眠未懒。清露霏衣还入扉,晓风欲起城鸦聒。”^{[8](卷十二)}该诗作于中法战争前夕,颈联隐喻时事,全诗通过冷峭清凄

意境,间接隐约地传递了诗人的忧思。以白描淡墨咏叹风景,时事的慨叹尽在不言中。

总的说来,袁昶大量的山水诗受其依违于仕隐之间的心态影响很大,袁昶希图用山水诗表现他想要摆脱现世羁绊的情怀;尽管他创作了一些清新秀美的作品,但他的山水诗作并不能摒弃世物,细心的读者不时可透视出时世的风云,形成一种特有的自我风貌,这或许正是诗人当时复杂的“朝隐”心态的无意表露。

三、“朝隐”心态与浙派诗学双重规约下之诗歌风貌

袁昶的诗风是他的秉赋、心态和学养在创作方面的延展。他赋性疏狂似魏晋间人,且萦系国事,其诗有时清远萧闲,有时险涩恢诡,有时寒苦味长,有时劲健苍茫;其学博极群书,其情率真执着,这造成其诗风格多样,取径宽广的特点。

袁昶在诗学观上认为“唐人以诗为学,宋人以学为诗,根抵华实不同,音节和严亦异。唐诗近风,风多短言,里巷谣谚男女赠答之所为也。宋诗近雅,雅多长言,士大夫伤时述事,短言之不足,故长言之,非老于国故世变者不能。”^[11]对唐宋两大诗型,袁昶区分其特点,但他并非要使两者对立。他诗作中推许黄庭坚、陆游以及梅曾亮等宋诗风,也赞扬樊增祥等宗唐诗人,他还“颇宗尚阮籍、孙绰、帛道猷、高允、颜黄门”^{[10](卷首)},推崇陶渊明和谢灵运;总的来说,他的诗学观点和沈曾植“三关说”大致相符,在诗学实践上他也朝着这一目标探求。

袁昶诗歌风貌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剖析。其一,袁昶受道家思想影响,为诗试图以“寓言”“卮言”的方式抒写其浓愁深忧,以怡情散怀的形式来讽托寓寄。老庄美学重视主体性情之真,袁昶作诗秉此,笔随意使,喷礴而出。另一方面,袁昶为腹笥博宏之士,在琢章炼句的过程中,诗人的学术修养往往在不经意中会自然流露出来。这使得袁昶诗歌中同时出现两种倾向,一是有的诗情意真挚,天骨开张,气势纵横;二则是晦涩奇险,百怪聱牙。

前者比较典型的作品如《哀山人》:“公生公死骑尾箕,剑也短衣日边哭。公去金精动桂林,为虺毋摧何毒淫。武昌鱼烂石头踞,九婴爨竈戈鋌森。剑也共伏大海阴,何不与彼木石同暗瘖。犹为周舍日谗谗,泪尽继血沾衣襟。康砖蝉翼俗方宝,何为矚目爱汝双南金。剑也瘡痍攻人心。连连蚩尤斩中翼。月氏好头

顷，何时作饮器。剑也张目未快意，一蛇四蛇异位置。海风吹堕幽州云，光气夜烛云间文。只鸡斗酒欲酹汝，剑也地下何当闻。”^[7](陈琰《艺苑丛话》)全诗从多个侧面勾勒了为封建法统所不容的“怪虫”式人物蒋敦复的精神，虽然挟杂着一些典故，但通体上气势排比畅放，如汪洋大海。又《阶下海棠盛开偶成一首遣兴》一诗，直抒胸中对列强侵略的愤慨，比起龚自珍《西郊落花诗》、陈宝琛《感春四首》、文廷式《落花》等同一题材名篇来，袁作显得用意径直，毫无隐晦晦晦之词。

后者最为突出的如名篇《地震诗》，诗歌排募拗折，想象怪异恢险。钱仲联先生指出此诗用意是影射李鸿章、文祥、奕訢、沈桂芬等人非栋梁之材^[7]。(《梦苕庵诗话》)地震这类题材，后世创作者多沿袭韩愈、卢仝等人的诗路，靠驱遣奇诡宏肆的想象来结构成篇。袁昶要求诗歌不作“闲言语”，他由地震自然地联想到时政的衰败，又自然地将矛头指向中枢大臣。虽然他在诗中直言“欲先去中国之蠹”，但通篇还是隐约其辞，诗人宏富的学问使他采摭了大量的神话人物和典故来布局谋篇。客观地说，袁昶采用的谋略虽能生成光怪陆离的陌生化效果，但过多的神怪事物与典故并不符合审美形象的鲜明性、生动性要求，读之并不能激起读者的审美创造。

其二，袁昶集中有“行春花乐，言寓思于衰骀，举目山河，独抚膺于逝者”^[12]，也有追求“老庄靡谢，山水未滋，勃窣廻穴，泓静萧瑟之际，致其角思理，发其性趣”^{[10](卷首)}的作品。(《于湖小集》题词)如《清晨偶书》云：“沧江号秋虫，轻阴笼淡日。秋花虽烂漫，气象亦萧瑟。蕉林匝地暗，翠扇展横逸。曾无修竹弹，任障层轩密。欲唤临池螭，掣穷草书律。汝岂任刻琬，中坚无一实。会看霜风至，真态萎黄出。吏舍乏佳兴，周旋窟一室。即鲜度世姿，惭无理人术。深斋抱微明，隙景难究诘。今固未心是，昨亦岂全失。得丧付混同，外物不可必。惟当假至言，斋心养衰疾。”^{[10](卷一)}诗歌的前数句写景，江沧烟轻，秋花、秋虫、秋叶，让人感到萧瑟黯淡。与此清虚景致相融和的是诗人的闲散心境，在最后10句，诗人顺势由景入理，将其对现实的忧患意识淡化，表现出冲淡和平的情调。试读袁昶所推崇的东晋诗人孙绰的《秋日》一诗，可见两者的神似之处。袁昶山水诗有清丽的写景之作，有清峭的寓恨之作，也有清远的释怀之作。面对日益深重的社会危机，诗人主体精神不可避免的要更多地关注现实，袁氏个人虽然刻意于山水诗，但社会的巨大阴影无声无息地投射在诗人的情感中，使他不能真正地怡山乐山，这样要想单纯靠刻摹山水而生新意已是难题。

其三，考察袁昶诗歌风格，论者基本上是从诗风转化的轨迹和师承家数两方面来探求的。近人周寿昌说袁氏“壬申以前之作，遣词闳丽，而犹濡入。丁丑、戊寅后诗，则脱去模拟之迹，动与古会，渐入简淡。”^{[8](卷首)}(周寿昌《浙西村人初集叙》)现代也有论者认为袁诗早期清远，中年以后趋于生新僻涩，两者差距较大。^[13]事实上，袁诗早岁诗作存留甚少，只是《浙西村人初集》中存留数卷。早期诗作摹拟之迹确实十分明显，如颇为诗论家所重的《晓发》《春行湖堤上》《地震诗》，风格酷似于中晚唐韦柳、韩孟诗，但不见得闳丽，也不偏于清远一格。《浙西村人初集》卷一开卷五言《咏蚶》即十分僻涩，同卷四言《火轮船行》也如此。袁昶僻涩尖新的诗风早期就已见端倪。而其后期所作《于湖小集》六卷，徐世昌《晚清诗话》认为“在东坡、临川之间”，不以生涩的山谷诗歌相类比。《于湖小集》中如《清晨偶书》《和友人夜至湖堤小桥上望月》《江上》等清峭之作，不见得僻涩。概言之，袁诗体貌前后期并无很明显的差别，只是随着诗歌实践的不断深入，袁诗日趋洗炼精清。

总的来说，袁昶诗学博综广取，论家一致认为袁诗“根抵鲍谢，而用事遣词力求僻涩，则纯乎祧唐抱宋者”^[14]，这正是对浙派“三关说”的实践。袁昶诗能够树骨魏晋，有其超远萧闲之旨趣，又不乏风云慷慨之蕴意；在面目上刻意尖新，不如东晋诗那样执着于字句雕饰刻镂，音律流转铿锵，而是极力发挥中唐、北宋诗以文为诗、以学为诗的特点，追求奥衍峭涩。但物极必反，过分的陌生化带来的往往是审美障碍。袁昶喜读道释典籍，诗中也爱用道佛典故，他并不喜诗中说理，运用典故大体也只为造成新奇斑驳的效果，并不能达到沈曾植“意、色、笔”相统一的境界。

参考文献：

- [1] 钱仲联. 当代学者自选文集(钱仲联卷)[M]. 合肥: 安徽教育出版社, 1999: 398.
- [2] 袁昶. 浙西钝叟遗文[M]. 上海图书馆藏稿本.
- [3] 袁梁肃, 袁允樨, 袁荣叟. 太常袁公行略[C]//中华历史人物别传集(第66册). 北京: 线装书局, 2003: 1-17.
- [4] 袁昶. 袁太常戊戌条陈[M]. 光绪28年铅印本.
- [5] 袁昶. 安般谶诗续钞. 已集[C]//续修四库全书(第1565册).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0.
- [6] 李详. 药里慵谈[J]. 小说月报, 1918, (第九卷第二号): 5.
- [7] 钱仲联. 清诗纪事[M]. 南京: 江苏古籍出版社, 1990: 12538.
- [8] 袁昶. 浙西村人初集[C]//续修四库全书(第1565册).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0.

(下转 294 页)